

东方讲坛 经典艺术
系列讲座丛书

风雅东方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编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东方讲坛 经典艺术
系列讲座丛书

第一辑

風雅東方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编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雅东方/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编.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8. 10

(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丛书: 1)

ISBN 978-7-80703-862-7

I. 风... II. 上... III. 艺术—文集 IV. 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3050 号

丛 书 名 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丛书

书 名 风雅东方

编 者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责任编辑 利春蓉

版式设计 杨 浚 杜晓敏 吴铮铮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www.bjph.net)(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61000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00 册

ISBN 978-7-80703-862-7/J·67

定 价 28.00 元

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丛书

总顾问

王仲伟

顾 问

陈 东 潘世伟 马春雷

编委会成员

生键红 尼 冰 何 畏

李 刚 梅雪林 温婷婷

杨 浚 范伟成 丁 丽

前 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满足市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市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为宗旨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市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及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上海东方文化之友联谊会承办的东方讲坛·经典艺术讲座作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部分，始终以“传播中外艺术经典，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己任，根据上海的市情、市民的特点，认真调研听众需求，精心策划选题，缜密组织，认真策划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戏剧类、曲艺类、文博类等方面的艺术赏析，并通过讲、演（示）相结合的方式，边讲边演，深入浅出，将经典艺术化为市民易懂易接受的内容，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讲座已经走过三周年的历程，也将迎来她的第一百期讲座。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宣传文化服务品牌以及东方讲坛的著名子品牌，经典艺术讲座为上海建设学习型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为丰富广大群

众的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广大市民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

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将艺术大师的精彩瞬间化为永恒,我们编辑了这本经典艺术讲座精选。本书撷取了东方讲坛·经典艺术讲座开办以来的部分精品讲座,内容涵盖经典音乐赏析、美术名家名作赏析、经典舞蹈艺术赏析、经典传统地方戏曲赏析以及文博类内容,后经由主讲人重新整理,可以说是一次经典再现。通过本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艺术大师或娓娓道来对艺术人生的感悟,或精心传授鉴赏经典艺术的要领,或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文艺理论,或剥茧抽丝般地剖析文化的内涵;或幽默或睿智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大师们的理性思索,展示出了他们对文化之美、艺术之美的孜孜追求和思考。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心,离不开东方讲坛办公室的悉心指导,离不开诸位艺术家的精心呵护,贺绿汀音乐厅有关同志的帮助,以及广大听众的厚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相信读者们可以从此书中得到诸多收获。

编者

2008年9月



音乐天堂

——从《梁祝》到“红色小提琴”

陈钢，中国当代著名的交响音乐作曲家之一。早年师从于父亲陈歌辛和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习作曲和钢琴，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又师从于丁善德院长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早在求学期间，他即以其与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

《梁祝》这首流传最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曾先后荣获多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此外，陈钢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红色小提琴系列”——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也都成为著名的中国小提琴音乐文献。1986年，他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被喻为《梁祝》的姊妹篇。陈钢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首竖琴独奏曲和第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和交响诗，大合唱和室内乐合奏等。他的作品以浓郁的民族情调和丰富的当代作曲技巧巧妙地融合而见长。

陈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他曾出访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并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音乐名人录”等十多项世界名人录。1995年，他被美国传记中心颁予“国际文化荣誉证书”。2002年末，荣获斯卡莫好莱坞大奖。

《蝴蝶恋人》从何而来？

今天，我是在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特别的地方，做一次特别的演讲。

为什么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5月27日，在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同一天，也就是1959年5月27日，《梁祝》诞生了。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梁祝》1959年5月4号第一次试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当年音乐学院礼堂的舞台上，由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何占豪演绎。何占豪拉小提琴，我弹钢琴，这个礼堂的隔壁还有一个半圆厅。说起半圆厅，还有一个故事：《梁祝》一开始是没有“化蝶”的。梁祝殉情以后都死了。听过试奏以后，大家非常难过，这时我们的党委书记孟波同志就提出来，梁祝死后一定要“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是一种更浪漫的反抗。于是我们增加了“化蝶”这一部分。从此以后，《梁祝》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蝴蝶情侣》或《蝴蝶恋人》。正因为有了“化蝶”，“蝴蝶”才成为《梁祝》的代号。而这个代号，就是在隔壁的半圆厅诞生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说这是一次特别的演讲？因为与《梁祝》有关的这段人生，对于我来说是很特别的，是我从来没有预设、没有预料到的一段艺术人生。今天讲起这个题目，我不禁百感交集。



▲ 陈钢在讲座现场

《梁祝》诞生了!

1959年5月27号下午三点钟,《梁祝》在兰心大戏院首演,那天的场面我历历在目。在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一群青年学生登上舞台演出这个作品。当时是一个新作品演奏会,就是两个学生写的一个新作品,就在演奏会上推出来。乐队指挥是我的同班同学樊承武,独奏是俞丽拿,何占豪在乐队里拉小提琴。我呢?则悄悄地躲在侧幕里面,等待着《梁祝》的命运。

俞丽拿当时只有十八岁,但她的演奏非常投入、非常专注。她拉完以后,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反应。当时我们很担心,大家对这个作品怎么会没有反应呢?观众静默的时间其实只有几秒钟,但我们觉得时间都凝固了。突然,掌声响起来了。不是雷鸣般的掌声,而是不快、不慢、不轻、不响的掌声,但是经久不歇。俞丽拿出来鞠躬,观众为她鼓掌;我们出来谢幕,观众继续鼓掌;指挥出来的时候,观众还在鼓掌。最后俞丽拿又走出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指挥,指挥想了想说:“再来一遍吧!”于是,这首二十五分钟长的协奏曲,就从头到尾再拉了一遍。一个新作品,而且是协奏曲,重新再来一遍,这在音乐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俞丽拉拉完以后,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每一位观众的眼睛里都含着激动的泪水。

“蝴蝶”高飞

首演第二天,这只“蝴蝶”就开始起飞了。当时没有电视,只是在收音机里播放。《梁祝》就随着电波飞到了全国,第二年又飞到了苏联。著名的指挥家曹鹏当时正在苏联留学,他听说这么一个作品后,非常兴奋,马上要国内寄谱子去,后来在苏联成功演出了这个作品。这是《梁祝》第一次飞到国外。

这只“蝴蝶”接着飞,飞到了香港。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在香港演出这首曲子的时候,乐曲名称用的是《蝴蝶恋人》。1981年我到美国,西崎崇子请我到她家里去。我看到她家里到处是蝴蝶:地毯上绣的是蝴蝶,她身上穿的是蝴蝶装,演出服后面也有蝴蝶。看到一个外国人对这首曲子如此痴迷,我深受感动。



▲ 陈钢与西崎崇子

1972 年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波士顿电台就介绍了《梁祝》。从此以后,“蝴蝶”飞遍了全世界。

法国小提琴大师杜梅,两米多高,我称他为“世界最高的梁山伯”。他去年在北京非常认真地演绎了《梁祝》。美国当代一个著名小提琴家夏汉姆,也非常成功地演绎过《梁祝》。



▲ 陈钢和法国小提琴大师杜梅在《梁祝》演出时的合影

这只“蝴蝶”最难忘的一次飞翔,是在 1997 年 7 月 2 号,也就是香港回归第二天,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碗型剧场里举行了一场庆祝香港回归的晚会。七十年来没有一个华人艺术家登上过这个剧场的舞台,那天是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由中国的指挥家指挥美国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的作品,其中有《梁祝》,演奏者是吕思清。洛杉矶是美国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大概有八十万人。那一天,两万多华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喜庆日子聚集在这个露天剧场。当吕思清登上舞台,拉响《梁祝》后,下面掌声如潮。假如说《梁祝》首演时掌声是经久不息的话,这一次就是掌声雷动。剧场后面是群山,当掌声响起来,感觉好像是从山里涌出来的一阵接一阵的声浪,令人震撼。这是我几十年里听到的对《梁祝》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喝彩。音乐会结束时,在雷动的掌声响起的同时,焰火喷射,照射出音乐会的主题:“Bravo China(向中国喝彩)”!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备感自豪。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曾经对我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好莱坞的那一夜,让我感觉到《梁祝》已经超越了音乐,成为中国的一个象征,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情感符号。那一夜,我感觉我们的理想就像《梁祝》即将跟随“嫦娥号”飞向月球一样,飞向了世界,飞到了月球,飞进全世界人的心里面。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和最大的骄傲。

时代的脉搏

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听《梁祝》,还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脉搏,感觉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纯洁心灵。不久前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你们写不出超越《梁祝》的作品?我说,《梁祝》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梁祝》时代的我们,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那是一个纯情的时代,一个理想的时代。当然,现在时代也很伟大,应该出现一个不同的伟大的声音,但不可能出现与《梁祝》相同的声音。

当时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当时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情景?而《梁祝》又为什么产生在那个时代?首先,当时的中国需要那样的声音。建国十周年时,我们的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但是,我们没有相匹配的交响乐、相匹配的伟大的声音。过去中国的交响乐园地是一片荒芜,世界交响乐殿堂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但交响乐代表着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顶峰,因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强烈呼唤我们创作出自己的交响乐。

基于时代的召唤、民族的召唤,我和何占豪这两个音乐学院的学生,怀着一片赤子之心,怀着奉献的心情,想填补我们交响乐的空白。当时我二十四岁,大学四年级,何占豪则是管弦乐系的进修生,当时二十六岁。一开始何占豪动员我写的时候,我拒绝了,因为我要写毕业作品。后来孟波同志和我的恩师丁善德院长决定由我和何占豪共同完成这个作品,我们就义不容辞担起了这个重任。我们运用承载了一千六百年以上历史的“梁祝”的民间传说,运用越剧丰富的音乐素材,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利用课余时间,创作出了这个作品。

那个年代,其实也是一个狂热的年代。1958年搞“大跃进”,提出全民皆兵、大炼钢铁、三面红旗、吃饭不要钱、十五年赶超英国,全国都被一片狂热的虚火燃烧着。这些火焰把我们卷进去了,使我们以燃烧的赤子之心、报国之心来写这个作品。但我们也不能被这团火焰吞没掉,必须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来创作。我们不想把音乐放在一个狭隘的民族化的框架里做,仅仅模仿一些戏曲、小提琴的演奏法,而是希望通过这个载体和国际接轨,用交响乐的语言、通过交响乐的平台和国际对话。二胡很好,但是二胡是二胡,小提琴是小提琴。我们必须用小提琴和小提琴对话,用交响乐和交响乐对话。这个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要突破民

族化,走向国际化。

按当时的形势,我们本应该写大炼钢铁,应该写女民兵。当时报上去三个题材:“大炼钢铁”,是俞丽拿的;“女民兵”,是沈西蒂的;最后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何占豪的。这是决定《梁祝》命运的第一关。假如我们的领导当时说要配合形势,把“大炼钢铁”、“女民兵”作为“主旋律”,他完全可以在第一或第二个题材上勾一勾。但孟波在第三个题材上勾了一勾。没有这一勾,就没有《梁祝》。

《梁祝》是逆潮流而作的



▲ 陈钢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祝》是逆潮流而作的。快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写人性、写人的真情、写爱,才是我们艺术中的主旋律,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当时孟波为什么说一定要写“化蝶”?他说,这是最浪漫的反抗,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作品里,恋人仅仅是殉情。但《梁祝》就是不死,死了以后也要到天上一一起飞翔。这是更高层次的浪漫的反抗,也是中国人精神的一种表现。

《梁祝》的成功在于它写了人性、写了爱情。当然,也正因为同样的原因,它后来在“文革”中被批判了,批判的理由

是:在大跃进的时候,怎么能写才子佳人?当时把孟波拖到台上批斗的时候,说他“比杀人犯还要杀人犯”,因为他领导了《梁祝》的创作。报纸上通栏大标题批判《梁祝》,说工人听了《梁祝》,开不动机器了;农民听了《梁祝》,拿不起锄头了;最严重的是,解放军听了《梁祝》,把枪打歪了……因为孟波支持《梁祝》的创作,所以成为罪人。但是历史证明,他是功臣!

《梁祝》虽然在“文革”的时候被宣判为“大毒草”,但它照样在地下流传,声音从未中断。“文革”后我听到一个故事,令我非常感动,是云南昆明大学的人告诉我的。昆明大学有一座塔楼。“文革”中工宣队进驻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半夜时塔楼有“鬼火”在闪动。他们判断是反革命谋乱,于是决定采取行动。某一天晚上,他们把塔楼包围起来了,看到“鬼火”闪动の時

候就破门而入。用电筒一照,发现是一群孩子蹲在地上,点着一盏煤油灯,开着一台老式唱机,在那儿听音乐。听什么呢?听《梁祝》。再看这些孩子,全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需要音乐,需要真善美,需要寻找人类的声音、人性的声音。就连孩子也不例外。

什么是经典?

很多人认为《梁祝》是中国的一个经典。什么是经典?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经典,也可以说那个是经典,那么,有没有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有的。英国的《泰晤士报》做过一个调查,问题是你认为“最伟大的音乐是什么”、“最伟大的戏剧是什么”、“最伟大的文学是什么”、“最伟大的电影是什么”、“最伟大的雕塑是什么”、“最伟大的流行音乐是什么”。很奇怪,答案几乎是一致的:最伟大的音乐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最伟大的电影是《公民凯恩》;最伟大的戏剧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最伟大的小说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最伟大的流行音乐是猫王的音乐。这是不同的人给出的共同答案。这就是经典。

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经典来支撑我们这个民族。《梁祝》之所以被誉为经典,是因为它传达了一种人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其他力量都达不到的。《梁祝》最大的成功,或许就在于此。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接下来说一说“红色小提琴”。姜文有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用了我的《金色的炉台》——“红色小提琴”中最早问世的一支曲子。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有时候,一种声音或一种味道可以把人带到真实的过去”。一谈到这句台词,就把我带到了真实的过去。

“红色小提琴”的作品都诞生在非常时期。那时,除了八个样板戏,整个乐坛都听不到其他声音。但是中国在那个时期特别需要音乐来抚慰心灵,尤其是年轻人。据我所知,光上海提琴厂每年就要生产十万把小提琴。当年,谁买得起钢琴?就十元、二十元买一把小提琴。音乐学院全关门了,大家就在自家拉琴,夏天天气热,大家赤膊上阵,站到阳台上拉。有一次到杭州,我还看见有人在山洞里拉琴。为什么?第一,人们需要音乐,如饥似渴地需要;第二,为了生存,假如你琴拉得好一点,也许你可以不上山下乡,可以考上文工团甚至样板戏团。正是出于对音乐的需要和生存的需要,大家要拉小提琴。但是,没有曲子拉。《梁

祝》是“大毒草”，不能拉，外国曲子叫“洋、名、古”，也不能拉，这就没曲子可拉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我个人又是什么情况？当时我刚从“牛棚”里出来，心情很痛苦、很困惑。我是一个出生在音乐世家的爱国青年、热血青年。我十四岁就当兵了。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在香港，我带着十三岁的弟弟和十二岁的妹妹在上海。十四岁是不能以参军的，但我那时候真是一心要投入革命，就用橡皮把证书上的“4”擦掉，改成“8”，再涂点酱油，想借此“混”入革命队伍。报名时我看到有的孩子和我一样小，大概也是冒充进去的。考官问他几岁，他说十八岁。考官再问十八岁的生肖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了。轮到考我时，他们不再问这个问题了，我也就“混”入了革命队伍。第二天，他们将我们这批“混入”的小鬼们集中起来，编成个青年队。

参军以后，有三件事情对我教育很大。那就是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吃的第一顿饭和穿的第一双鞋。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是《解放区的天》。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那时候孩子们都背了一个小板凳，围着大饭桶，看到黄灿灿、香喷喷的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一吃，牙齿都快掉下来了，原来是从未见过的的小米！我们穿的第一双鞋子又是什么呢？那是比皮鞋还厚的布鞋，是山东老大娘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双布鞋。后来我到山东老区的时候非常感慨，因为在田埂上耕地的基本都是老人、女人，年轻人都到前线去了，很多人都牺牲了。我们穿的鞋子，就是这些留在家乡的乡亲们给子弟兵一针针缝出来的。所以，参军以后的第一首歌、第一顿饭、第一双鞋子，我永远不会忘记。

劫难会过去，音乐会回来

我明明是红小鬼，为什么会在“文革”中进“牛棚”呢？当时我怎么想都想不通。我的父亲也追求进步，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写了很多出色的作品，《玫瑰玫瑰我爱你》就是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这首歌1950年传到美国，1951年就登入了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听说当时给作者的稿酬是一百万美金，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到二千万美金。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和美国是敌对关系。我父亲又兴奋又紧张，马上发表声明说，假如拿到这笔钱，马上买一架飞机，捐给国家打美国鬼子。这也是一段佳话，说明了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

我们这一对爱国的父子，怎么一下子变成牛鬼蛇神了？想不通。但是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因为我闯了一个祸，写了一个电影音乐，被江青点名批评为“大毒草”。我的音乐里用了现代派手法，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我还因此被发配到大别山劳动了三个月。当时，我住在一个老红军的家里。这个老红军为中国的革命

丢掉了一条腿,是一个残疾老人。我每天和他同吃同住。我早上砍柴,下午挑水、推磨、烧火,和他一起吃一顿饭。他是个老红军,为革命付出了一切,但他得到的只有这些。他能承受下来,我为什么不能承受下来?我的心开始变得平静。大别山是没有交通的,进去都是挑着扁担进去,我回来时就把这根扁担带回来了,挂在钢琴上面,让自己永远记住这段日子,记住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回想“文革”,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受苦,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受难。这是一个劫难,但这个劫难一定会过去。当时我每天回去都听马勒的第四交响曲的慢乐章。每次听,都觉得它在安慰你:一切劫难都会过去,音乐会再回来。

与潘寅林相识的岁月

当我从“牛棚”出来的时候,上海出来一个人,就是潘寅林。他那时候刚从附中毕业,还没进大学,就在交响乐团当首席。成千上万的琴童如饥似渴地需要



陈钢与潘寅林▶

音乐的时候,潘寅林把我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拉出来,让我帮他写曲子。我就写了《金色的炉台》。潘寅林一拉,马上电台就播了,万人空巷来听音乐。那时潘

寅林每天要接到好多信,他当时在上海的人气高到什么程度呢?他骑自行车,遇到红灯,交警说:“潘寅林,绿灯,过去!”从他们对潘寅林的态度你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是多么需要音乐,多么需要小提琴。我在他们的感动下,一口气写了九首曲子,包括《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文革”中大家拉的小提琴曲,几乎都是我写的。我在没有阳光的时候写阳光,没有早晨的时候写早晨,没有金色的时候写金色,因为我坚信,真正的人类的声音、人性的声音、真善美的声音是不会湮没的,它永远是人们需要的东西。

我同潘寅林有三十多年的合作,后来他到国外担任乐团首席。他原本可以在世界各地争取更高的地位,但他怀着报国之心,应交响乐团的邀请,又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又继续合作,将我们当年的红色之旅进行下去。

开不败的红玫瑰

我对“红色”的解释有三句话:红色,是我们花样年华时的一抹朝霞;红色,是我们蹉跎岁月里的血色浪漫;红色,更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颜色,需要这样的心灵,需要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当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温暖的、明亮的颜色,中国才能真正强大,真正崛起!

去年在北大演出之前,我们做了一次“实验”。我当时有点怀疑,几十年前感动那么多人的作品,在几十年以后,还能不能感动现在的年轻人?这一点,我们从去年北大百年纪念堂里两千一百多大学生听众出席的演出和上个礼拜我们在大连有七千个学生听众出席的三场演出中,从学生们的反应中得到了答案。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年代,甚至也没有听过这些作品,但是,他们都被这些作品所感动、所震撼。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糖水里长大,但他们同样需要好的音乐给予他们力量。国外的很多大学都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核心价值”?我想,无论我们经济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没有核心价值,没有信仰,没有美的武装的话,我们就会丧失文化的脊梁骨。

乘着音乐的翅膀飞翔

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提出了一个口号,“美育救国”。他在临终以前讲了八个字,“科技兴国,美育救国”。假如说科技是物质层面的话,那么美育就在精神层面,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们必须用

美来武装自己,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两扇翅膀飞翔了——不仅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而且美可以使我们心灵升华,使我们得到精神力量。

我在莫斯科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1992年,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到千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一个千万富翁一晚上就变成了一个万元户。第二天,虽然人家都还在为黄油面包担心,但还是照样排着队去听交响乐。什么交响乐?就是马勒的交响乐。马勒的交响乐很长,有四十分钟;听完以后,全体起立鼓掌。鼓多久?也是四十分钟!你们想想,当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当人们正在为面包、黄油担忧的时候,却还排着队去听马勒的交响乐,而且在听完以后鼓四十分钟的掌……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摧毁的,因为它有美的支撑,有文化的支撑。



▲ 陈钢与著名旅美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

爱因斯坦讲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他自己就是这样,把音乐当作生命。有一天,他弹钢琴弹到一半休止符的时候,灵感突发,走到楼上工作室开始工作,两个礼拜之后拿出了相对论。不是说相对论是弹钢琴弹出来的,但音乐确实给了他很多想象。爱因斯坦死了以后,美国的脑科学家曾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切片检查,发现他的大脑神经突触比普通人多得多。这是因为他经常拉小提琴,而左手管右脑,当他的左手手指飞速运动时,会刺激右脑神经,丰富他的想象力。我们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在1991年12月22日接受国家最高褒奖时,满怀深情地介绍他的太太蒋英:“我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蒋英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演唱最